

隨試題所附的文字，節選自 Edward W. Said 著，單德興譯的《知識分子論》一書，請先閱讀，而後作答。

一、閱讀理解能力測驗（60%）

1. 本文所謂：「二十世紀對於知識分子最著名的兩個描述」，是指哪兩個描述？（10%）
2. 文中的「我」對於這兩個描述的意見如何？（20%）
3. 本文認為「知識分子」這個角色有其「尖銳」的一面，請根據本文的觀點，說明這種「尖銳」性。（15%）
4. 本文認為「知識分子」就是「專業人士」嗎？為什麼？（15%）

二、寫作能力測驗（40%）

請自訂題目，書寫一篇關於「知識分子」的短文。

第一章 知識分子的代表

薩德德著
吳德興譯

知識分子究竟為數眾多，或只是一群極少數的菁英？二十世紀對於知識分子最著名的兩個描述，就這一點基本上是對立的。第一個描述來自葛蘭西。葛蘭西是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行動派、新聞從業人員、傑出的政治哲學家，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被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 下獄囚禁。他在《獄中札記》寫道：「因此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葛蘭西自己的生涯就示範了他所認定的知識分子的角色：他接受過歷史語言學的專業訓練，既是義大利勞工運動的組織者，而且在自己從事的新聞業中也是最具反省意識的社會分析家，他的目標不只要造成社會運動，而且要塑造與此運動相關的整個文化形成 (cultural formation)。

葛蘭西試著顯示，在社會中履行知識分子作用的人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傳統的知識分子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師、教士、行政官吏，這類人代代從事相同的工作；第二類是有機的知識分子 (organic intellectuals)，在葛蘭西眼中，這類人與階級或企業直接相關，而這些階級或企業運用知識分子來組織利益，贏得更多的權力，獲取更多的控制。因此，葛蘭西對於有機的知識分子有如下的說法：「資本主義的企業主在創造自己的同時，也創造出了工業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專家、新文化的組織者、新法律系統的組織者等等。」●今天的廣告或公關專家，設計各種技術來為某家清潔劑公司或航空公司贏取更多的市場，根據葛蘭西的說法，這些人可以被視為有機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在民主社會中試著獲取潛在顧客的首肯、贏得贊同、引導消費者或選民的意見。葛蘭西相信有機的知識分子主動參與社會，也就是說，他們一直努力去改變眾人的心意、拓展市場；老師和教士似乎多多少少停留原處，年復一年從事同樣的工作，而有機的知識分子則一直在行動、在創造。

另一個極端則是班達對於知識分子著名的定義：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 (philosopher-kings)，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班達流傳後世的論著《知識分子之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 與其說是有系統地分析知識分子的生活，不如說是猛烈抨擊放棄了召喚、妥協了原則的知識分子，然而他的確提到了少數人名以及他認為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主要特質。他經常提到蘇格拉底 (Socrates, 469-399 B.C.) 和耶穌 (Jesus Christ, 4 B.C.-33 A.D.)，較近的英範則是史賓諾莎 (Benedict de Spinoza, 1632-1677)、伏爾泰 (Jean François Arouet Voltaire, 1694-1778)、勒南 (Ernest Renan, 1823-1892)。●真正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知識階層 (clergy)，的確是稀有罕見之人，因為他們支持、維護的正是屬於這個世界的真理與正義的永恆標準。因此，班達對這些人用了宗教術語——神職人員 (clerics)，其地位和表現的突出一直與世俗之人形成對比，因為凡夫俗子感興趣的是物質的利益、個人的晉升，而且可能的話，與世俗的權勢保持密切關係。他說，真正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活動本質上不是追求實用的目的，而是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尋求樂趣，簡言之，就是樂於尋求擁有非物質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種方式說：『我的國度不屬於這世界』」。

然而，班達所舉的例子顯示他並不支持這種觀念：完全抽離的、超乎世俗的、象牙塔裏的思想家，極爲孤立並獻身於深奧、甚至可能是玄奧的題材。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熱情以及正義、真理的超然無私的原則感召時，叱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他說：「需要我舉出費內隆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1651-1715) 和馬悉隆 (Jean-Baptiste Massillon, 1663-1742) 如何叱責路易十四的某些戰爭的事例嗎？●伏爾泰如何譴責巴列丁奈特 (the Palatinate, 德國萊茵河西岸一地區，昔爲德意志帝國內之一國) 的毀滅？勒南如何叱責拿破崙的暴力？巴克爾 (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 英國歷史學家) 如何叱責英國對於法國革命的不容忍？以及在我們的時代，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如何叱責日耳曼對於法蘭西的殘暴？」●根據班達的看法，當今處境之難處在於他們已經把自己的道德權威讓給了他所謂的「集體激情的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passions”) 這個具有先見之明的詞彙，這個詞彙的內容包括了宗派觀念、群眾情緒、民族主義的好勇鬥狠、階級利益等。班達寫作的年代是一九二七年，遠在大眾媒體時代之前，但是他意識到對政府而言把那些知識分子充作僕役是多麼重要的事，把知識分子召來不是爲了領導大眾，而是爲了鞏固政府的政策，發布文宣來打擊官方的敵人，甘言美語，而且擴而書之，類似歐威爾式的新語 (Orwellian Newspeak) 那樣的種種體系 (譯按：源出歐威爾所著小說《一九八四》，描寫大洋國爲統治方便，創造了一些新詞彙，如思想犯罪 [Thoughtcrime]、雙重思想 [doublethink] 等)，以體制的「權宜措施」或「國家榮譽」之名來裝扮真相。

班達對於知識分子背叛的悲歎，其力量不是來自他論辯的精微細緻，也不是來自他那難以實行的絕對主義——他對於知識分子的使命有著毫不妥協的看法。根據班達的定義，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甘冒被燒死、放逐、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險。他們是具有象徵性的人物，其特徵在於堅決遠離現實的關注。像這樣的人數量必然不多，也無法以例行的方式培育出來。他們必須是具有堅強人格的徹徹底底的個人，尤其必須是處於幾乎永遠反對現狀的狀態；基於上述種種理由，班達的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是一群少數、耀眼的人——他從未把女人算在內——這些人由高處向芸芸眾生發出洪亮的聲音和無禮的叱責。班達從未暗示這些人是如何知道真理的，也未說明他們對於永恆原則的炫目見解是否可能像堂吉珂德 (Don Quixote) 的見識一般，充其量不過是私人的幻想。

但是至少我心中毫不懷疑班達大致構思出之真正知識分子的形象依然具有吸引力及信服力。他的許多正、反面的例證都具說服力，例如，伏爾泰爲卡拉家族 (The Calas Affair) 公開辯護，或者——相反的一端——像巴魯斯 (Maurice Barrès, 1862-1923) 這類法國作家駭人聽聞的民族主義，班達認爲這類作家以法國國家榮譽之名，遂行一種「粗魯、輕薄的浪漫主義」。●班達在精神上受到德雷福斯事件 (Dreyfus Affair) 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塑造，這兩個事件對於知識分子都是嚴格的考驗，知識分子可以不是選擇勇於發聲反對反猶太人的軍法不公和民族主義的狂熱，就是如羔羊般順服群眾，拒絕爲受到不公平判刑的猶太裔軍官德雷福斯辯護，口中誦唱著侵略主義的口號，以激起反對所有德國事物的戰爭狂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班達重新出版他的書，這次增加了一連串對於知識分子的攻擊，這些知識分子是和納粹合作的人以及熱情擁抱而不批判共產黨的人。●

班達的作品基本上很保守，但在他戰鬥性的修辭深處卻找到這種知識分子的形象：特立獨行的人，能向權勢說真話的人，耿直、雄辯、極爲勇敢及憤怒的個人，對他而言，沒有什麼世間權勢是龐大、壯觀到不可以批評、直截了當地責難的。

葛蘭西把知識分子視爲符合社會中一套特殊作用的人，這種社會分析遠較班達的觀點接近現實，尤其在二十世紀末期，許多新興行業印證了葛蘭西的見識——廣播員，學院專業人士，電腦分析師，運動和媒體律師，業務顧問，政策專家，政府顧問，特殊市場報告的作者，以及近代大眾新聞業這一行本身。

今天，在與知識生產或分配相關的任何領域工作的每個人，都是葛蘭西所定義的知識分子。在大多數工業化的西方社會裏，所謂的知識工業 (knowledge industries) 以及與實際生產相關的工業，二者之間的比例朝著知識工業的方向激增。美國社會學家古德諾 (Alvin W. Gouldner) 幾年前就說知識分子是新階級，而掌理知識者現在很多已經取代了舊式的有產階級。但古德諾也說，知識分子隨著地位的晉升，也不再是向廣大公眾發言的人了，相反的，他們成爲他所謂的批評論述文化 (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 的成員。

●每位知識分子，書籍的編輯和作者，軍事戰略家和國際律師，所說、所用的語言都變成專業的，可爲相同領域的其他成員所使用，而專家與專家之間的共通語言是非專業人士大都難以理解的。

同樣的，法國哲學家傅柯說，所謂普遍的知識分子 (universal intellectual) ——他心裏想的也許是沙特——他們的地位已經被「特殊的」知識分子 ("specific" intellectual) 所取代，●這些特殊的知識分子在一個行業中工作，但能以任何方式運用他們的專長。這裏，傅柯特別想到的就是美國物理學家歐本海默，歐本海默在一九四二至四五年主持洛斯·阿拉莫斯 (Los Alamos) 原子彈計畫時，離開了他的專業領域，後來成爲美國科學事務中類似政委的角色。

知識分子的衍生甚至擴大到許多領域，在這些領域中知識分子已經成爲被研究的對象。這些主張也許跟隨葛蘭西《獄中札記》率先提出的看法，幾乎是首次把知識分子，而不是社會階級，視爲在近代社會運作中占有樞紐的地位。只要把「的」字和「與」字加在「知識分子」一詞之旁，幾乎立刻就在我們眼前出現連篇累牘有關知識分子的研究，不但範圍驚人，而且研究深入。現成可用的有數以千計有關知識分子的不同歷史和社會學，以及有關知識分子與國族主義、權力、傳統、革命等等無窮無盡的研究。世界各地都有其知識分子，而那些形成中的每一個都被熱烈地辯論、爭議。近代史中的主要革命，知識分子無役不與，同樣的，主要的反革命運動，知識分子也是無役不與。知識分子一直是運動的父母，當然也是子女，甚至私生子女等等。

這裏存在著一個危險：知識分子的風姿或形象可能消失於一大堆細枝末節中，而淪爲只是社會趨勢中的另一個專業人士或人物。我在這一系列演講中的論點所視爲理所當然的，就是原先葛蘭西所主張而在二十世紀末成爲現實的情況，但我也堅持主張知識分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化約爲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幹成員。我認爲，對我來說中心的事實是，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 公眾以及「爲」(for) 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

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知識分子這麼做時根據的是普遍的原則：在涉及自由和正義時，全人類都有權期望從世間權勢或國家中獲得正當的行為標準；必須勇敢地指證、對抗任何有意或無意違犯這些標準的行為。

讓我以自己為例來說明這一點：身為知識分子，我在觀眾或訴求對象之前提出我的關切，但這並不只關係著我如何發表它們，也關係著自己作為嘗試促進自由、正義的理念的人士所代表的。我把這些形諸書詞或筆墨，是因為經過深自省思後這些是我所相信的，而且我也要說服別人接受這個觀點。因此，這裏就出現了個人世界與公共世界之間很複雜的混合——一方面是來自我的經驗的個人的歷史、價值、寫作、立場，另一方面是這些如何進入社交世界，人們在其中辯論、決定有關戰爭、自由、正義的事。一己的知識分子（a 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因為一旦形諸文字並且發表，就已經進入了公共世界。只是公共的知識分子（a public intellectual）——一個人只是作為某個理念、運動或立場的傀儡、發言人或象徵——也是不存在的。總是存在著個人的變化和一己的感性，而這些使得知識分子所說或所寫的具有意義。最不應該的就是知識分子討好閱聽大眾；總括來說，就在於形成尷尬、對立，甚至不愉快。

總之，重要的是知識分子作為代表性的人物，明目張膽地代表某種立場，不畏各種艱難險阻向他的公眾明白代表。我的論點是：知識分子是以代表藝術（the art of representing）為業的個人，不管那是演說、寫作、教學或上電視。而那個行業之重要在於那是大眾認可的，而且涉及奉獻與冒險，勇敢與可能受到傷害。我在閱讀沙特或羅素的作品時，他們特殊的、個人的聲音和風範讓我留下的印象遠超過他們的論點，因為他們為自己的信念而發言，不可能把他們誤認為籍籍無名的公務員或小心翼翼的官僚。

在有關知識分子汗牛充棟的研究中，定義知識分子的不勝枚舉，但對於他們的形象、特徵、實際的介入和表現的評量卻不足，而這些結合起來構成每位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命脈。柏林（Isiah Berlin, 1969）對於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曾有如下說法：他們的讀者部分受到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意識到作家是站在公共的舞台上作證」。●就我看來，那種氣質多少依然關係著近代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那也就是為什麼當我們憶起像沙特這樣的知識分子時，記得的是個人的風格，甘冒重大的風險，以全然的努力、冒險、意志來討論殖民主義、獻身、社會衝突，這些說法激怒他的對手，鼓舞他的朋友，甚至事後回想起來也許會讓自己覺得尷尬。……